

文化差异视角下贸易便利化对文化创意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

孔晗爽, 高长春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5日

摘要

文化创意产品兼具商品价值与文化内涵, 其出口不仅受目的国通关效率等正式制度的影响, 也受文化差异等非正式制度的制约。现有贸易便利化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贸易流量或一般制造业企业层面, 较少专门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独特属性展开分析。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与文化折扣理论, 将文化差异引入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绩效的分析框架, 探讨二者的协同作用, 并利用2016~2023年中国199家文化创意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文创企业出口, 文化距离显著抑制出口; 文化距离整体上正向调节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 即文化差异越大,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的边际贡献越强, 但调节效应的方向取决于文化距离的具体维度。异质性分析表明, 贸易便利化的出口促进效应主要体现于非国有企业。本文从文化差异视角拓展了贸易便利化微观层面的研究边界, 为优化贸易便利化改革与制定差异化跨文化策略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

贸易便利化, 文化差异, 文化创意企业, 出口绩效

The Impa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on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Fi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Hanshuang Kong, Changchun Gao

Glorious Su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April 16, 2026; accepted: April 27, 2026; published: June 5, 2026

Abstrac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mbody both commercial valu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making their exports subject not only to formal institutions like customs efficiency in destination countries but also to informal institutions such as cultural differences. While existing studies on trade facilitation predominantly focus on macro-level trade flows or general manufacturing firms, limited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distinctive attributes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Drawing on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nd cultural discount theory,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rade facilitation and firm export performance, examining their synergistic effects. Using panel data of 199 listed Chinese cultural and creative firms from 2016 to 2023, we find that trade facilit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xports, whereas cultural distance exert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Notably, cultural distance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export-enhancing effect of trade facilitation—the greater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the stronger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trade facilitation to firm's exports. However, the direction of this moderating effect depends on the specific dimensions of cultural distanc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is promoting effect is concentrated among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By introducing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this paper extends the micro-level research boundary of trade facilitation and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optimizing trade facilitation reforms and designing differentiated cross-cultural strategies.

Keywords

Trade Facilitation, Cultural Differences, Cultural and Creative Firms, Export Perform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贸易便利化是近年来国际贸易领域持续关注的焦点议题。2017年，《贸易便利化协定》正式生效，这是我国加入WTO以来签署的首个多边货物贸易协定，其核心目标是系统性降低跨境贸易成本。在全球贸易格局深刻变革、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贸易便利化对于维持和促进国际贸易流动的战略意义愈发凸显。

学术界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早期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考察贸易便利化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1][2]，发现港口效率、海关环境、制度质量和电子商务等维度的改善能够显著扩大贸易规模。随着微观数据可得性的提高，学者们开始将研究视角从国家、行业层面下沉至企业层面，探讨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涉及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3]、出口增加值[4]、出口技术复杂度[5]以及企业出口行为选择[6]等多个维度。这些研究为理解贸易便利化的微观传导机制提供了重要证据。

然而，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大多聚焦于一般制造业企业，较少关注具有独特属性的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品与普通工业制成品有着本质区别——它不仅具有满足消费者功能性需求的商品价值，更承载着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审美观念、价值取向与精神内涵。这种“观念价值”的存在意味着，在文创产品贸易中，文化距离这一变量可能扮演着比一般货物贸易更为重要的角色。

既有研究在处理文化距离与贸易的关系时，主要沿着两条理论路径展开。一是“文化折扣”路径，认为文化差异会降低目的国消费者对进口文化产品的接受度与理解度，从而抑制贸易[7]；二是“消费成

“瘾”路径,认为文化创意产品的独特性能满足消费者的猎奇需求,文化差异反而可能促进出口[8]。然而,这些研究[9][10]大多将文化距离作为单独的解释变量纳入引力模型,尚未将其与贸易便利化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系统考察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贸易便利化能否弥补文化距离带来的出口障碍?文化距离究竟是强化还是削弱了贸易便利化的制度红利?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将文化差异与贸易便利化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分析二者对企业出口绩效的直接影响与协同效应。第二,在实证分析上,基于中国文化创意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 Driscoll-Kraay 标准误处理截面相关问题,并通过多种检验方法确保结论的可靠性。第三,在机制深化上,从分维度调节效应与所有制异质性两个层面展开分析,揭示了不同文化维度的差异化作用以及贸易便利化对非国有企业更强的促进效应。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贸易便利化影响文创企业出口绩效的机制

贸易便利化的本质是通过制度优化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依据交易成本理论,企业在跨境贸易中面临信息搜寻成本、谈判签约成本、行政合规成本、运输时间成本等多重贸易摩擦,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障碍。贸易便利化正是针对这些摩擦的制度性解决方案:通过推进通关一体化、建立单一窗口、实施无纸化贸易等措施,系统性地降低企业出口面临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

具体而言,贸易便利化可通过两条渠道影响文创企业出口绩效。其一,直接降低出口成本。贸易便利化措施能够缩短货物放行时间、简化单证要求、提高规制透明度,直接降低企业出口过程中的程序性成本和不确定性成本。对于文创企业而言,其产品多为高附加值、强时效性的创意产品,通关效率的提升意味着更快的市场响应速度和更低的库存成本,这对企业出口绩效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其二,提升进口中间品质量与种类。贸易便利化降低了国外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门槛,使文创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取更多样、更优质的进口中间品与服务。进口中间品成本的下降使企业得以将更多资源配置于创意研发与市场开拓,从而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出口绩效[11]。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H1: 贸易便利化对文化创意企业出口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2.2. 文化距离影响文创企业出口绩效的机制

文化距离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在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审美偏好等文化维度上的差异程度。对于文化创意产品而言,文化距离的影响较一般货物贸易更为深远,主要通过“文化折扣”与“消费成瘾”两条相反的理论路径发挥作用。

文化折扣理论认为,文化创意产品的价值实现依赖于消费者的文化理解与情感共鸣。当产品出口到文化距离较大的市场时,当地消费者可能因文化背景差异而难以理解产品的创意理念与文化内涵,导致产品在消费者主观效用评估中“大打折扣”,从而降低需求,抑制出口。这一机制在影视、出版、艺术品等核心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7]。与之相对,消费成瘾理论则认为,文化创意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独特创意,这种独特性恰好能够满足文化背景相异的消费者对新鲜感的追求。消费者在初次接触外来文化产品后,可能因“品味培养”而形成持续消费偏好,文化差异反而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差异化优势。然而,在跨国贸易实践中,文化折扣效应往往更为显著且稳定,消费成瘾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的市场培育和消费者教育。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H2: 文化距离因文化折扣效应而降低文化创意企业出口绩效。

2.3. 文化距离对贸易便利化效应的调节作用

贸易便利化与文化距离分别代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在文创企业出口过程中并非独立发挥作用,而是存在协同与交互的复杂关系。

当企业面向文化距离较小的市场时,国家间语言、价值观、消费习惯等方面的相似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可以通过社会关系、文化亲近感等渠道部分替代正式制度的便利功能。此时,贸易便利化虽然仍有积极作用,但其边际贡献相对有限。相反,当企业进入文化距离较大的市场时,文化折扣效应与交易成本叠加,企业面临显著的出口阻力。在这一情境下,正式制度便利的价值被放大:高效的通关程序能够减少产品在跨境环节的时间损耗与不确定性,透明的规制环境能够降低企业的信息搜寻与合规成本,这些制度红利在文化障碍较大的市场中具有更高的边际收益。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距离是一个多维概念,不同文化维度的差异可能改变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关系。在某些文化情境中,贸易便利化与文化距离之间可能并非互补,而是排斥。例如,有些社会本身就高度重视规则和程序规范,其国内贸易制度本身已经较为完善;又如,有些社会更崇尚自发的市场竞争和个人能力,对制度的需求本就不高,贸易便利化的边际效果便比较有限。在这些情形下,文化距离不但不会放大贸易便利化的作用,反而可能削弱甚至抵消其效果。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H3a: 文化距离正向调节贸易便利化对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即文化距离越大,贸易便利化的边际贡献越强。

H3b: 文化距离负向调节贸易便利化对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即文化距离越大,贸易便利化的边际贡献越弱。

两种假设分别对应不同的理论逻辑,最终哪种效应占主导,取决于文化距离的具体维度。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文化创意产业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 2016~2023 年。参照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标准,将 CSMAR 数据库与东方财富网行业分类进行匹配,并将国证香蜜湖文化创意指数作为补充参考,剔除 ST 及 ST* 企业后,最终获得 199 家上市公司,共 1592 个企业-年份观测值。

企业海外收入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主营业务收入-按地区划分”模块。文化距离数据来源于 Hofstede 官方网站最新发布的六维度文化得分(调整后 0~100 分版本),剔除维度缺失的国家后,确定 49 个样本国家(地区)。贸易便利化指标参考 UNCTAD 每两年发布一次的《数字和可持续贸易便利化:全球报告》¹。控制变量均取自 CSMAR 数据库。数据处理工具为 stata 18.0。

3.2. 变量定义与测度

3.2.1. 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绩效(ln_exp)

采用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海外收入”衡量出口绩效,若某年海外收入为零则取 1,做自然对数处理。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文化距离(w_cd):采用 Kogut & Singh 指数法计算中国与 49 个目的国(地区)的文化距离,计算公式为:

$$CD_j = \sum_i^{i=6} \left[\left(I_{ij} - I_{iCH} \right)^2 / V_i \right] / 6$$

¹网址链接: <https://www.unctad.org/>, 可在页面右下角“Download the report”下载查看历年报告。

指标说明: i : 文化距离的 6 个维度; I_{ij} : j 国家在 i 维度的得分; I_{iCH} : 中国在 i 维度的得分; V_i : 所有样本国家在 i 维度得分的方差。

进一步以 UNCTAD 统计的中国对各目的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份额为权重, 构建企业 - 年份层面的加权文化距离。

贸易便利化(w_tfi): 学术界使用最广泛的测度方法是 Wilson 等[1]提出的指标体系。然而, 受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 世界经济论坛自 2020 年起停止更新《全球竞争力报告》², 导致 Wilson 框架下的多个二级指标数据无法获取。为此, 本文参考 Masood 等[12]的研究, 改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数字和可持续贸易便利化: 全球报告》数据[13]。本文选取其中与一般贸易便利化相关的 5 个二级指标(见表 1),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第一主成分(方差贡献率 64.8%), 并将得分线性映射至 1~100 区间。同样以出口份额为权重进行加权处理, 得到企业 - 年份层面的加权贸易便利化水平。

Table 1. Trade facilitation indicator system (UNCTAD)

表 1.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基于 UNCTAD)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符号	指标属性	得分范围	数据来源	时间范围
一般贸易便利化	透明度	U ₁	正指标	0~1	UNCTAD	2016~2023, 每两年发布 一次
	形式	U ₂	正指标	0~1	UNCTAD	
	机构安排与合作	U ₃	正指标	0~1	UNCTAD	
	无纸化贸易	U ₄	正指标	0~1	UNCTAD	
	跨境无纸化贸易	U ₅	正指标	0~1	UNCTAD	

3.2.3. 控制变量

包括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取对数)、研发投入强度 rd (研发支出/营业收入)、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所有制性质 soe (国有企业取 1, 否则取 0)、无形资产占比 intan (无形资产/总资产)。

3.3. 数据局限与模型设定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数据结构存在一定局限。理想的设定应构建“企业 - 目的国 - 年份”三维面板, 但上市公司年报仅披露海外收入总额, 未区分国别。为此, 本文以 UNCTAD 统计的中国文创产品对 49 个样本国家的出口份额为权重, 对文化距离和贸易便利化指标进行加权, 构建企业 - 年份二维数据。2016~2023 年间中国对样本国家的出口份额均超过 85%, 代表性较好。

这一处理带来了两个计量影响。其一, 加权后核心解释变量在每年内对所有企业取值相同且样本期间波动较小, 固定效应模型会吸收其大部分变异, 故本文采用混合 OLS 估计。其二, 同一年份企业的残差可能受到共同宏观冲击而产生截面相关。Pesaran CD 检验(CD = 17.172, p = 0.000)证实了截面相关的存在, 传统聚类标准误无法有效处理。因此, 本文采用 Driscoll-Kraay 标准误, 以同时控制异方差、自相关和截面相关。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ln \exp_{it} = \alpha_i + \delta_t + \beta_1 w_tfi_{it} + \beta_2 w_cd_{it} + \beta_3 w_tfi_{it} * w_cd_{it} + \gamma X_{it} + \varepsilon_{it}$$

其中 α_i 为企业固定效应, δ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X_{it} 为控制变量集。本文采用混合 OLS 模型和 Driscoll-Kraay 标准误, 以同时控制企业内序列相关和横截面依赖。

²网址链接: <https://cn.weforum.org/publications/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20/>, 可在下方查看本系列中其他报告。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

为避免交互项与主效应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在回归前对加权贸易便利化(tfi)、加权文化距离(w_cd)以及生成的交互项(tfi_w_cd)做了中心化处理，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模型(1)显示，在平均文化距离水平下，贸易便利化每提高1个单位，企业出口额对数增加0.114，在5%水平上显著，H1得到验证。模型(2)显示，文化距离的系数为-6.186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文化距离对出口绩效具有直接抑制作用，H2得到支持。模型(3)加入交互项后，贸易便利化与文化距离的主效应均保持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文化距离正向调节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H3a得到验证。这说明当企业面对整体文化差异较大的陌生市场时，制度便利变得更为关键，其边际收益更高；而在文化相近的市场中，文化亲近感可以部分替代制度的作用。

Table 2. Basic analysis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ln_exp	ln_exp	ln_exp
	b/se	b/se	b/se
tfi_c	0.114** (0.041)		0.069*** (0.017)
w_cd_c		-6.186* (3.149)	-8.293*** (1.607)
tfi_w_cd_c			1.867*** (0.411)
size	0.626*** (0.055)	0.631*** (0.060)	0.624*** (0.053)
rd	-5.509 (3.664)	-4.568 (2.927)	-6.429 (3.436)
lev	0.688 (1.308)	0.846 (1.174)	0.531 (1.292)
soe	-6.944*** (0.363)	-6.884*** (0.375)	-6.965*** (0.366)
intan	-13.347** (4.853)	-13.280** (4.822)	-13.395** (4.857)
_cons	-1.061* (0.508)	-1.288** (0.484)	-0.785 (0.547)
N	1592	1592	1592

注：*P < 0.05，**P < 0.01，***P < 0.001。

4.2. 内生性检验

为缓解反向因果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L_tfi)替代当期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L_tfi_c 的系数为 0.065 且在 1%水平上显著, 与主回归的 0.069 高度接近; w_cd_c 的系数为-7.246, 交互项系数为 1.934 且在 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考虑内生性后, 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Table 3. Endogeneity test

表 3. 内生性检验结果

	(1)	(2)	(3)
	ln_exp	ln_exp	ln_exp
	b/se	b/se	b/se
L_tfi_c	0.086* (0.037)		0.065*** (0.011)
w_cd_c		-6.186* (3.149)	-7.246** (2.007)
L_tfi_w_cd_c			1.934** (0.561)
size	0.664*** (0.064)	0.631*** (0.060)	0.665*** (0.062)
rd	-6.297 (3.568)	-4.568 (2.927)	-7.075* (3.549)
lev	0.369 (1.427)	0.846 (1.174)	0.213 (1.440)
soe	-7.078*** (0.336)	-6.884*** (0.375)	-7.110*** (0.332)
intan	-15.323*** (4.108)	-13.280** (4.822)	-15.423*** (4.096)
_cons	-1.438* (0.610)	-1.288** (0.484)	-1.329* (0.620)
N	1393	1592	1393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4.3. 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两个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 分时段回归。将样本划分为 2016~2019 年与 2020~2023 年两个子区间分别回归。结果显示, 2020~2023 年子样本中所有核心变量均显著且方向与主回归一致; 2016~2019 年子样本中单独效应显著但交互项不显著, 可能源于《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初期企业尚处于

适应阶段, 调节效应具有时间滞后性。

第二,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采用基于 Wilson 框架的传统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14] [15] (涵盖港口效率、海关环境、制度环境、电子商务与金融四个维度)重新测算并回归, 时间范围为 2016~2019 年。结果显示核心变量均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 2020 年后数字化贸易迎来爆发式增长, 传统货物贸易指标对文创产业的适用性有所下降, 而以无纸化贸易、跨境信息互通为核心的数字便利化指标更能反映文创企业面临的实际制度环境。

4.4. 异质性检验

表 4 报告了按企业所有制分组的回归结果。非国有企业组(soe = 0)中, tfi_c 系数为 0.063 且在 1%水平上显著, w_cd_c 系数为-11.510, 交互项系数为 2.491, 均与主回归方向一致且高度显著。而国有企业组(soe = 1)中, 所有核心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这一差异可能源于非国有企业对市场信号更为敏感、决策机制更为灵活, 能够更快速地捕捉贸易便利化带来的制度红利; 而国有企业可能面临多重非市场目标约束, 或已具备较为成熟的海外渠道, 从而削弱了贸易便利化的边际效应。

Table 4. Heterogeneity test (soe)

表 4.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1)	(2)
	ln_exp	ln_exp
	b/se	b/se
tfi_c	0.063*** (0.016)	0.035 (0.039)
w_cd_c	-11.510*** (1.906)	3.452 (2.467)
tfi_w_cd_c	2.491*** (0.507)	-0.370 (0.620)
size	0.609*** (0.062)	-0.396 (0.314)
rd	-7.729* (3.686)	-6.070** (2.258)
lev	1.028 (1.098)	-1.031 (2.692)
intan	-0.625 (5.621)	-46.381*** (6.296)
_cons	-0.945 (0.792)	17.083** (5.882)
N	1297	295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5. 进一步分析

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中的 H3a 假设, 表明从总体上看, 正向调节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一总效应可能掩盖了不同维度之间方向上的差异。文化距离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概念, Hofstede 将其分为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短期导向、放纵/约束六个维度[16]。为进一步探究不同文化维度对贸易便利化效应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将总文化距离替换为六个分维度指标, 分别构建交互项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Sub-dimensional regression

表 5. 分维度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ln_exp	ln_exp	ln_exp	ln_exp	ln_exp	ln_exp
	b/se	b/se	b/se	b/se	b/se	b/se
tfi_c	0.118*** (0.026)	0.065** (0.019)	0.072** (0.023)	0.094*** (0.024)	0.078*** (0.021)	0.079*** (0.021)
tfi_w_cd1_c	1.072** (0.316)					
tfi_w_cd2_c		0.470*** (0.115)				
tfi_w_cd3_c			-2.747** (0.987)			
tfi_w_cd4_c				-1.111*** (0.269)		
tfi_w_cd5_c					0.673*** (0.127)	
tfi_w_cd6_c						1.195*** (0.230)
size	0.624*** (0.054)	0.624*** (0.053)	0.624*** (0.054)	0.623*** (0.054)	0.624*** (0.054)	0.624*** (0.054)
rd	-5.996 (3.524)	-6.456 (3.425)	-6.272 (3.456)	-6.195 (3.445)	-6.154 (3.494)	-6.180 (3.464)
lev	0.617 (1.297)	0.527 (1.290)	0.551 (1.294)	0.571 (1.291)	0.568 (1.298)	0.569 (1.294)
soe	-6.947*** (0.368)	-6.963*** (0.366)	-6.962*** (0.366)	-6.957*** (0.371)	-6.965*** (0.365)	-6.961*** (0.369)

续表

intan	-13.334** (4.868)	-13.385** (4.860)	-13.389** (4.856)	-13.368** (4.867)	-13.405** (4.851)	-13.388** (4.860)
_cons	-1.001 (0.540)	-0.792 (0.541)	-0.844 (0.521)	-0.897 (0.529)	-0.833 (0.544)	-0.835 (0.533)
N	1592	1592	1592	1592	1592	1592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回归结果显示, 六个维度的交互项系数在方向和显著性上出现了明显分化。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长期导向与放纵四个维度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 进一步支持了 H3a。相反, 男性气质与不确定性规避维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支持了 H3b 的负向调节逻辑, 在这两类文化特征明显的市场中, 文化距离反而削弱了贸易便利化的积极作用。

这一结果表明, 文化距离的调节效应具有明显的维度异质性, 基准回归中观察到的正向总效应, 是多数维度正向调节作用大于少数维度负向调节作用的结果。H3a 与 H3b 并非互斥, 而是在不同文化维度上分别得到验证。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将文化差异引入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绩效的分析框架, 系统考察了二者对文创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及其交互效应。基于 2016~2023 年中国 199 家文化创意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 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文创企业出口, 文化距离显著抑制出口。贸易便利化通过降低通关成本、简化行政程序等渠道有效减少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而文化距离则因文化折扣效应占据主导地位, 削弱了目的国消费者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

第二, 文化距离对贸易便利化的调节效应具有双重性。从总体上看, 文化差异越大,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的边际贡献越强。这一发现是本文的核心创新点, 它揭示了在文化创意产业中,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协同关系。但分维度检验反映了调节方向上的分化: 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长期导向与放纵维度呈正向调节; 男性气质与不确定性规避维度则呈负向调节。因此, 这种协同作用可以概括为: 当文化差异导致企业对正式制度的需求上升时, 调节效应为正, 当目的国制度较为完善或市场主体对制度的依赖性较低时, 调节效应转为负向。

第三, 贸易便利化的出口促进效应主要体现于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受益不显著。

6.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持续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 充分释放其对文创企业出口的制度红利。应继续深化通关一体化、单一窗口、无纸化贸易等便利化措施, 尤其注重将贸易便利化向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新兴领域延伸, 以适应文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

第二, 实施差异化的跨文化市场策略。文创企业在选择出口目的地时, 不应简单回避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 而应综合评估目标市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在文化差异显著但便利化程度较高的市场中, 企业

应充分利用制度红利弥补文化折扣的负面影响。政府层面可针对文化距离较大的目标市场, 优先推进贸易便利化合作, 为文创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创造更有利的制度环境。

第三, 精准扶持非国有文创企业出口。鉴于贸易便利化的出口促进效应主要体现于非国有企业, 政策资源应向民营、外资等非国有文创企业适度倾斜, 如提供定向的出口便利化服务、简化相关审批流程、加强通关指导等, 进一步激发其出口潜力。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 第一, 受数据可得性限制, 采用加权平均法构建企业-年份层面宏观变量, 无法精确识别企业对不同目的国的异质性出口行为。未来可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企业-目的国层面的出口数据, 开展更为精细的三维面板分析。第二, 样本仅覆盖 A 股上市文创企业。未来可考虑将新三板企业、非上市文创企业纳入研究范围。第三, 本文聚焦于文化距离这一非正式制度, 未来可将语言差异、制度距离等其他制度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构建更为全面的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 [1] Wilson, J.S., Mann, C.L. and Otsuki, T. (2003) Trade Facili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ew Approach to Quantifying the Impact.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7, 367-389. <https://doi.org/10.1093/wber/lhg027>
- [2] Wilson, J.S., Mann, C.L. and Otsuki, T. (2005) Assessing the Benefits of Trade Facilit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 World Economy*, 28, 841-871. <https://doi.org/10.1111/j.1467-9701.2005.00709.x>
- [3] 段文奇, 徐邦栋, 刘晨阳. 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J]. 国际贸易问题, 2020(12): 33-50.
- [4] 杨继军, 刘依凡, 李宏亮.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J]. 财贸经济, 2020, 41(4): 115-128.
- [5] 肖扬, 直银苹, 谢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J]. 宏观经济研究, 2020(9): 164-175.
- [6] 李波, 张雨微. 贸易便利化、企业异质性与出口绩效[J]. 开发研究, 2022(5): 100-111.
- [7] 曲如晓, 杨修, 刘杨. 文化差异、贸易成本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J]. 世界经济, 2015, 38(9): 130-143.
- [8] 卫迎春, 钟晓玥. 消费成瘾、文化折扣与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J]. 学习与实践, 2016(6): 128-134.
- [9] 范兆斌, 黄淑娟. 文化距离对“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产品贸易效率影响的随机前沿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 2017(4): 125-140.
- [10] 任文龙. 文化距离影响了文化产品出口质量吗?——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J]. 艺术百家, 2023, 39(5): 46-53.
- [11] 程凯. 贸易便利化、进口中间品与企业出口绩效[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0): 1-16.
- [12] Masood, A. and Martínez-Zarzoso, I. (2024) Trade Effects of Trade Facilitation Revisited. *Economics Letters*, 234, Article ID: 111477. <https://doi.org/10.1016/j.econlet.2023.111477>
- [13] (2026) UN Global Survey on Digital and Sustainable Trade Facilitation. <https://www.unftsurvey.org/>
- [14] 孔庆峰, 董虹蔚. “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12): 158-168.
- [15] 江瑶, 高长春. “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对创意产品贸易出口的影响研究[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8(3): 49-59.
- [16] Hofstede, G. (2011) Dimensionalizing Cultures: The Hofstede Model in Context. *Online Readings in Psychology and Culture*, 2, Article 8. <https://doi.org/10.9707/2307-0919.1014>